

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文献综述

马 丁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4年5月29日；录用日期：2024年6月27日；发布日期：2024年9月3日

摘 要

代际收入流动性是衡量社会机会公平的重要因素。代际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加剧，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基于文献的视角，我们首先发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是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最主要的因素。其次，我们梳理了我国代际收入流动的现状和趋势，发现学者们对于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并不一致，甚至还出现较大差异，但总体来说，我国的代际收入弹性呈上升趋势。最后，我们发现代际收入流动存在性别差异，子代女性相比于子代男性代际收入弹性更高，可能的原因是父代对子代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资存在性别差异。

关键词

代际收入流动，代际收入弹性系数，机会不平等，性别差异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China: A Literature Review

Ding Ma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May 29th, 2024; accepted: Jun. 27th, 2024; published: Sep. 3rd, 2024

Abstract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measure social opportunity equity. The aggrav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inequali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our country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we first find that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wealth capital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Secondly, we sorted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our country, and found that scholars' estimates of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lasticity are not consistent, and there are even large differences, but generally speak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lasticity of our country is on the rise. Finally, we fou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with offspring females having higher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lasticity compared to offspring males. This may be due to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rental investment in offspring's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Keywords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lasticity Coefficient,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Gender Differences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同时，效率优先的发展方式也导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我国基尼系数长期保持在 0.4 警戒线以上。在此背景下，一旦收入水平在父代和子代之间的传递趋于稳定，那么后果就是社会阶层固化[1]。由于阶级跃升渠道的堵塞，收入处在低等水平的人们会受到巨大的影响，人们会失去工作的动力，从而影响到一个国家正常的社会经济运行[2]。代际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加剧，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般来说，子代和父代的收入水平存在关联，子代收入水平或多或少会受到父代收入水平的影响，学者们普遍使用代际收入弹性来衡量这种影响。代际收入弹性低，表明子代所获得的收入水平更多依靠的是自己的努力和才能，这意味着社会更公平。相反，代际收入弹性高，则表明子代所获得的收入水平受父代影响大，同样也意味着社会阶层更趋于固化。目前，关于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已经有了不少理论和实证的研究进展。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进行评述：1) 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财富资本三个方面。2) 中国代际流动的现状及趋势。3) 代际收入流动的性别差异。

2. 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

人力资本、财富资本与社会资本是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最重要的三个影响因素。陈琳和袁志刚研究表明，人力资本、财富资本和社会资本可以解释中国代际收入流动的大部分，其中父代对子代的财富转移又是最主要的收入传递方式[3]。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人力资本投资对子代的收入影响更高；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小城市，则是父代的社会资本转移对子代的收入影响更高，也越容易造成阶级固化[4]。

2.1.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包括教育、健康、智商等内容，与代际间的机会传导有着密切联系，是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重要因素。Chevalier 等在研究中用工资和工资涨幅来衡量教育的回报率，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是影响经济收入的重要因素[5]。元寿伟在研究中教育作用机制进行分解，发现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镇，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解释程度均处于较高水平[6]。教育投入是人力资本累积的重要因素，学者们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视角研究了其对子代永久收入的影响。

从微观角度看，家庭对子代的教育投资与子代的永久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7]。Becker 和 Tomes 认为

子代的收入受自身人力资本的影响，在代际收入流动的过程中，父代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8][9]。郭丛斌和闵维方研究表明，教育对收入代际流动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0]。袁青青研究表明，教育可以有效促进代际收入向上流动，同时也可以减缓代际收入向下流动的趋势[11]。李军将父代所受的教育年限和教育质量作为解释变量，实证得出此二者共同影响子代的人力资本[12]。

从宏观角度来看，国家可以通过公共教育体制的改革来影响人力资本，从而影响代际收入流动。芬兰通过教育改革促进机会公平，代际收入流动水平得到了有效改善[13]。而在我国，伴随着《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和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代际教育流动性显著提高，且贫困家庭在政策支持下受益更多[14]。父代受教育水平越低，这两项政策的作用就更显著[15]。由于贫困家庭在孩子早期教育时可能并没有太多的财富积累，从而父母对子代的早期教育投入较少，而加大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共教育支出，可以缓解代际收入的不平等，增强代际间收入流动[1]。即存在这样的传导机制，财政教育支出可以缩减对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贫富差距，有效促进社会机会公平，进而提高了代际收入流动水平。更进一步的，陈琳认为在整个教育阶段中，高等教育投入的作用并不明显，而增加幼托和初中教育的公共投入对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更为有效[16]。

2.2. 社会资本

在社会的社交网络中，个体与个体之间有着普遍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社会资本。通俗来说，社会资本是一种能够通过社交网络获得特权的能力，社会资本能够帮助个体获得更好的机会。社会资本一般用职业、政治身份和行业等来衡量，可以在父母和子女之间进行传递，同样对代际收入流动有着重要影响[17]。陈琳和袁志刚通过研究子女在工作中的身份属性，得出了子代的社会资本变量，结果表明：子代职业身份特性的社会资本可以解释子代代际收入弹性的 10%左右[18]。卓玛草和孔祥利运用因素分析法对社会资本进行测度，发现其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很明显[19]。杨瑞龙等研究表明，权利寻租真实效应存在，父母的政治身份对子代收入有较为显著的影响[20]。

一般来说，出于对孩子的爱护，父母更愿意将自身所掌握的优质社会资源传承给孩子。这种传承可以提高子代获取经济地位的效率，但同时也会导致阶级封闭，扩大公众的不公平感[21]。社会资本会加强父代收入的传递，且对于高收入阶层更为有利[22]。在代际收入流动的传导路径中，人力资本的解释力度较大，但社会资本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23]。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政策制度逐渐趋于完善，社会资本对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弱[24]。

2.3. 财富资本

在代际收入流动研究过程中，财富资本同样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目前为止，将财富资本作为代际收入流动的传导路径的研究较少。在子代的婚姻中，父代会通过彩礼嫁妆等形式将财富转移到子代。婚姻匹配对子代收入的影响不容忽视，是代际收入传递的重要途径[25]。另外，拥有企业的家族，通常也会把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控制权向子代继承[26]。在中国，一个家庭自身的经济状况，所拥有财富资本的多寡，都会直接影响子女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27]。

在我国，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许多人通过投资房产快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同时，我国的金融市场在不断扩大，富人们可以通过出借金融资本来获取大量的财富。陈琳和袁志刚研究表明，以房屋资产和金融资产为代表的家庭财富资本对代际收入流动的解释力远大于其他资产[18]。可以看出，父代对子代的财富资本转移是代际收入流动最直接的实现形式[3]。

3. 中国代际收入流动的现状与趋势

代际收入弹性(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 of income, 简称 IGE)是文献中最常用的衡量代际收入流动性

的指标。Becker and Tomes [9]最早给出了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方程：

$$\ln y_{it} = \alpha + \beta \ln y_{0i} + \varepsilon_i$$

其中， $\ln y_{0i}$ 代表父代的相对收入水平， $\ln y_{it}$ 代表子代的相对收入水平，回归系数 β 即为代际收入弹性。代际收入流动性用 $(1 - \beta)$ 来衡量。代际收入弹性系数越高，意味着子女收入更多的继承于父辈，代际收入流动趋于固化，即代际流动性更差，社会更不公平。学者们基于不同的数据库对我国的代际收入弹性进行测算，大多得到了较高的结果[28]-[30]。这意味着我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有着较大的改善空间。

大多数学者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研究代际收入流动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趋势。Deng 等基于 CHIP 数据计算得出，中国 1995 年城镇居民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为 0.47，2002 年系数提高到 0.53 [29]；尹恒等研究发现相比于 1991 年到 1995 年，在 1998 年至 2002 年间，中国社会代际收入流动性先是有了显著的提升[31]；陈琳认为从 1988 年到 2005 年之间，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整体呈上升趋势[3]；何石军和王桂田基 CHNS 数据，研究表明在 2000 年到 2009 年之间，中国社会代际收入流动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家庭条件对子女收入的影响依然非常显著[32]。杨沫研究发现，在 2004 年之前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基本保持稳定，在 2004 年以后则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33]。可以看出，在 2000 年后的一段时间，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明显提高。

4. 代际收入流动的性别差异

性别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重要因素。在中国，男性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要高于女性[34][35]，这意味着女性相比于男性，其个人的收入部分会更多的继承父辈。前文提到，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重要因素。在代际收入传递的过程中，父代可以通过自己的见识和社会关系来为子代提供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又或者是父代通过自身的学习经验，学习方法来影响子代的人力资本。在中国社会，大多数家庭对男性子代的期望要高于女性子代，所以对于男性子代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也要多于女性，这可能是造成代际收入流动性别差异的最主要原因。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这两项影响机制的性别差异做出了研究，我们可以通过了解代际职业与代际教育的性别差异来探析代际流动视角下的性别收入差异。

4.1. 职业与代际收入流动性别差异

一般来说，职业地位的高低与收入是正相关的，中国家庭受传统的子承父业思想的影响，女性在代际职业传承方面有着天然的劣势。受中国传统观念影响，女性会自愿或被迫从事无报酬劳动，比如在家照顾长辈，做家庭主妇。同时，女性在职业获得方面也有天然的劣势，在面对同样的一份工作时，男性获得工作的机会相比于女性要大得多，这都会导致男性和女性的收入不平等。更进一步，即使男性和女性处在同样等级的工作中，他们所获得的收入仍然有性别差异[36]。陈煜婷研究表明，在自致性代际职业向上流动中，男性比女性更占优势[37]。尹玉琳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中产阶级，认为代际流动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更容易子承父业，女性则面临更高的代际职业向下流动的风险；当存在代际职业继承时，女性能够利用父辈资源能够改善“地位结构差异”，而子女发生代际职业流动时，女性相比于男性无法有效的整合父辈资源，扭转劣势地位，表现为代际收入差距更加突出[38]。季珽(2020)用父代的职业阶层来解释代际流动的性别差异，处在低阶层的家庭男性子代比女性子代更容易实现代际向上流动；而阶层越高的家庭，男性子代相比女性子代也更容易向下流动[39]。

4.2. 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性别差异

父代受教育水平与子代的人力资本息息相关，教育会影响子代的人力资本，进而影响子代的收入。

杜凤莲等在研究中指出父母自身受教育程度会影响性别收入差距[40]。在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女性子代更可能获得较低或是与父母相同的教育水平,即向下流动或是不流动,而男性子代则更有可能实现向上流动[34]。袁青青和刘泽云研究表明相比于男性子代,教育可以显著促进女性子代的代际收入流动[11]。龚继红和廖梦雪研究表明,教育能够抑制我国居民代际收入向下流动,女性收入更依赖于父代的收入获得,女性教育代际向上流动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大于男性,意味着对于女性而言教育向上流动能更为有效地促进其代际收入流动,减小两性在收入上的差异[41]。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农村的教育性别差距一直在缩小,而随着父母教育程度的提高,教育性别差距也在缩小(Dong *et al.* 2020) [42]。

5. 结论

本文对近年来日益增加的关于我国代际流动性的研究进行回顾。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大多学者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这三个传导路径来分析代际收入流动。1) 人力资本。在代际收入流动中,人力资本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教育投入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从微观角度来看,家庭对子代的教育投资显著影响子代的永久收入;从宏观角度来看,《义务教育法》和高校扩招政策促进了我国的代际收入向上流动,但同时存在有城乡差异。2) 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一般用职业、政治身份和行业等来衡量,是代际收入流动的重要路径。父代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特性直接干预子代所能获得的教育资源和就业机会,也可以利用其职业特性来影响子代的职业倾向,从而促进代际收入流动。3) 财富资本。财富资本的转移是代际收入流动最直接的方式。我国遗产税尚未征收,这使得父代更倾向于将自己的财富转移给子代。同时,“选型婚配”中的财富转移也成为了代际收入流动的主要途径。彩礼、房子、车子等所谓的“刚需”也加大了父代对子代的财富转移。尽管关于财富资本对代际收入流动的研究较少,但不可否认的是,财富资本对代际收入流动有着巨大的解释力。

从中国社会整体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上来看,学者们均得到了较高的代际收入弹性,普遍认为代际收入流动有着提升空间。从代际收入流动的时间趋势上来看,在200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居民代际流动性呈现出上升趋势。

最后,我们通过梳理文献讨论了代际收入流动性别差异,在中国,父母与女性子代的代际收入弹性高于父母与男性子代的代际收入弹性。从职业和教育两个角度来看,男性和女性间存在机会不平等,从而导致代际收入流动存在性别差异。

参考文献

- [1] 杨娟, 赖德胜, 邱牧远. 如何通过教育缓解收入不平等? [J]. 经济研究, 2015, 50(9): 86-99.
- [2] 李力行, 周广肃. 代际传递、社会流动性及其变化趋势——来自收入、职业、教育、政治身份的多角度分析[J]. 浙江社会科学, 2014(5): 11-21.
- [3] 陈琳, 袁志刚. 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趋势与内在传递机制[J]. 世界经济, 2012, 35(6): 115-131.
- [4] 刘诗谣. 资源枯竭型城市矿二代代际流动研究[J]. 青年研究, 2020(3): 15-26+94.
- [5] Chevalier, A., Harmon, C., Walker, I., *et al.* (2004) Does Education Raise Productivity, or Just Reflect It? *The Economic Journal*, **114**, F499-F517. <https://doi.org/10.1111/j.1468-0297.2004.00256.x>
- [6] 元寿伟. 中国代际收入传递趋势及教育在传递中的作用[J]. 统计研究, 2016, 33(5): 77-86.
- [7] Dustmann, C. (2008) Return Migration, Investment in Children,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Comparing Sons of Foreign- and Native-Born Father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3**, 299-324. <https://doi.org/10.1353/jhr.2008.0000>
- [8] Becker, G.S. and Tomes, N. (1986) Human Capital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milie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4**, S1-S39. <https://doi.org/10.1086/298118>
- [9] Becker, G.S. and Tomes, N. (1979) 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7**, 1153-1189. <https://doi.org/10.1086/260831>

- [10] 郭丛斌, 闵维方. 教育: 创设合理的代际流动机制——结构方程模型在教育与代际流动关系研究中的应用[J]. 教育研究, 2009, 30(10): 5-12.
- [11] 袁青青, 刘泽云. 教育在代际收入流动中的作用——基于中介效应分析的研究[J]. 教育经济评论, 2022, 7(1): 3-22.
- [12] 李军, 周安华. “学二代”现象普遍存在吗?——基于教育数量和质量的代际流动研究[J]. 教育与经济, 2018(6): 33-44.
- [13] Pekkarinen, T., Uusitalo, R. and Kerr, S. (2006) School Tracki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126 Evidence from the Finnish Comprehensive School Reform.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3**, 965-973. <https://doi.org/10.1016/j.jpubeco.2009.04.006>
- [14] 陈斌开, 张淑娟, 申广军. 义务教育能提高代际流动性吗? [J]. 金融研究, 2021(6): 76-94.
- [15] 彭骏, 赵西亮. 教育政策对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基于中国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21.
- [16] 陈琳. 中国城镇代际收入弹性研究: 测量误差的纠正和收入影响的识别[J]. 经济学(季刊), 2016, 15(1): 33-52.
- [17] Loury, G. (1981)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Earnings. *Econometrica*, **49**, 843-867. <https://doi.org/10.2307/1912506>
- [18] 陈琳, 袁志刚.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财富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中国代际收入流动[J].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4): 99-113+124.
- [19] 卓玛草, 孔祥利. 农民工收入与社会关系网络——基于关系强度与资源的因果效应分析[J]. 经济经纬, 2016, 33(6): 48-53.
- [20] 杨瑞龙, 王宇锋, 刘和旺. 父亲政治身份、政治关系和子女收入[J]. 经济学(季刊), 2010, 9(3): 871-890.
- [21] 樊平. 社会流动与社会资本——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路径分析[J]. 江苏社会科学, 2004(1): 28-35.
- [22] 周晔馨. 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吗?——基于中国农户收入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12(7): 83-95.
- [23] 连增, 何蓉, 李超, 等.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代际收入传递——关于中国的实证研究[J]. 区域与全球发展, 2018, 2(1): 120-135+158.
- [24] Zhang, S., Lu, M. and Zhang, Y. (2007) Does the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on Poverty Reduction Fall or Rise during Marketization?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No. 2, 539-560.
- [25] 刘怡, 李智慧, 耿志祥. 婚姻匹配、代际流动与家庭模式的个税改革[J]. 管理世界, 2017(9): 60-72.
- [26] 杨光飞. 财富分化、子承父权与华人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J]. 社会科学, 2010(7): 27-35.
- [27] 程小纯, 龙莹. 中国家庭收入流动性与收入不平等的实证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14(9): 79-85.
- [28] Fan, Y., Yi, J.J. and Zhang, J.S. (2021) Rising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Persistence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13**, 202-230. <https://doi.org/10.1257/pol.20170097>
- [29] Deng, Q., Gustafsson, B. and Li, S. (2013)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Persistence in Urban China.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9**, 416-436. <https://doi.org/10.1111/roiw.12034>
- [30] Qin, X., Wang, T. and Zhuang, C.C. (2016)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Human Capital and Its Impact on Income Mobility: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38**, 306-321. <https://doi.org/10.1016/j.chieco.2014.10.005>
- [31] 尹恒, 李实, 邓曲恒. 中国城镇个人收入流动性研究[J]. 经济研究, 2006, 41(10): 30-43.
- [32] 何石军, 王桂田. 代际网络、父辈权力与子女收入——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的分析[J]. 经济科学, 2013(4): 65-78.
- [33] 杨沫, 王岩. 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及影响机制研究[J]. 管理世界, 2020, 36(3): 60-76.
- [34] 杜凤莲, 石婧, 张悦平, 等. 有其父必有其子吗?中国教育代际传递规模与影响因素分析[J]. 劳动经济研究, 2019, 7(1): 32-51.
- [35] 刘李华, 孙早. 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水平、来源与潜力测算——来自 CGSS 和 CHIP 的经验证据[J]. 南开经济研究, 2022(4): 22-42.
- [36] 陈芳. 社会转型期职业流动的性别分化——以江苏省为例[J]. 南方人口, 2008, 3(23): 59-64.
- [37] 陈煜婷. 代际职业流动视角下性别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J]. 晋阳学刊, 2016(6): 91-104.
- [38] 尹玉琳. 中产阶层代际流动的性别差异研究[J]. 中国经济问题, 2019(6): 44-57.
- [39] 季琰, 梁琳. 代际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J]. 南开经济研究, 2020(2): 25-48.

-
- [40] Huo, Y.J. and Golley, J. (2022)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 Transmission in China: The Gender Dimension. *China Economic Review*, **71**, Article ID: 101710. <https://doi.org/10.1016/j.chieco.2021.101710>
- [41] 龚继红, 廖梦雪. 性别视角下教育代际流动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差异[J]. 学习与实践, 2024(3): 81-93.
- [42] Dong, Y., Bai, Y., Wang, W., *et al.* (2020) Does Gender Matter for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77**, Article ID: 102220. <https://doi.org/10.1016/j.ijedudev.2020.102220>